

前 言

本书的主人公唐武宗李瀛炎、唐宣宗李忱是唐朝晚期的两个皇帝，如果以宣宗去世的大中十三年（858年）算起，距离唐朝灭亡恰好五十年的时间。他们所处的时代，唐朝的统治危机在不断酝酿和加深，昔日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腐朽和没落。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仅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来说，时起时伏的藩镇割据、混战，愈演愈烈的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相为表里，恶性互动，对唐朝晚期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破坏了以皇帝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分化、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加速了王朝政治走向黑暗腐朽的进程。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面对既定的衰落局面，日益暴露出他们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局限性。

然而，通过对武宗、宣宗时期社会形势的考察，我

们便不难发现，唐朝的统治危机尽管由来已久，各种社会矛盾尽管已经很尖锐，但是还未曾达到一触即发的临界程度。在统治阶级内部自上而下仍然不乏求治进取的愿望，事实也说明，当时也还有具有实现这种愿望的可能性和条件。综观武宗、宣宗的所作所为，虽然不能与唐朝前期帝王的文治武功相提并论，在唐朝晚期特定的社会历史形势下，他们为巩固王朝统治所进行的努力，也是值得称道的。

“牛李党争”是唐朝晚期发生在不同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对削弱统治阶级的力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武、宣时期则处在这一纷争的最后阶段。武宗即位后，改变了文宗时或共用两党，或对两党同时摒弃不用的政策，专用李德裕一党。宣宗即位，又尽反“会昌之政”，全部排斥李党，任用牛党。这种情形固然与武、宣二帝出于个人利害和好恶，或偏向李党或偏向牛党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在牛李二党分别执政时亦未停止倾轧，其所施为也未必全是以朝廷大局为重。但在客观上却避免了文宗时两党互为仇敌，不遗余力，“每议政之际，是非蜂起”，专注于泄私愤、图报复而影响朝政正确决策的情形。

武宗朝政事中，被史家称道的一是平定“泽潞之乱”，二是废毁佛教。“泽潞之乱”是唐朝晚期藩镇公开对抗中央的一起典型事件，这时唐朝的国力虽然已经远远不能与宪宗时相比，朝廷倾全国的军力、财力，历时一年有余，而且是利用了叛军内部的矛盾才最终平定了叛乱。但是，武宗在向来主张对藩镇采取强硬政策的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为之运筹帷幄，平叛的态度十分坚

定，这不仅使发动叛乱的刘稹等人陷入孤立，就是惯于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河北藩镇也慑于压力，俯首听命，接受指挥和调遣。当武宗派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谕河北诸藩，催促他们进兵伐叛时，诸节度使无不“具囊鞬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马，让制使先行，自兵兴以来，未之有也”。武宗平定“泽潞之乱”，对威慑藩镇，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武宗废佛是佛教发展史和唐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武宗实行压制打击佛教的政策，固然与他崇信道教有关，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随着佛教的发展，“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寺院兼并了大量土地，奴役了大批劳动人手，其经济势力的膨胀，与世俗地主阶级以及朝廷的根本利益发生尖锐冲突而引起的。通过打击寺院经济势力，缓解财政困窘，是武宗废佛的主要动机和出发点。

武宗废佛的结果，拆毁寺院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邑堂等四万余处，勒令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没收寺院、僧尼所有的土地“数千万顷”，解放被寺院役使的奴婢十五万人，这些还俗僧尼和解放奴婢，按照废佛法令均充作向国家纳税的两税户。

尽管在此后不久的宣宗时又复兴佛教，但经过武宗废佛的打击，佛教在宗教、经济上的势力一蹶不振，元气大伤，这对于缓和僧俗地主阶级的矛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改善劳动者的地位和境遇，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应当给予肯定的评价。

宣宗李忱在唐朝晚期的诸帝中以力图有所作为而颇受史家称道，盛赞“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誉之为

“小太宗”。这其中无疑包含了史家对宣宗的阿谀吹捧之辞，但通过对宣宗一朝史事的考察，他在勤政恤民、接受谏诤、严以督吏、约束皇亲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进取求治精神，在唐朝统治走向衰落的大背景下，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尽管宣宗的许多措施在具体执行中被打折了折扣，并没有完全落实，甚至变成一纸空文，尽管他的努力不能改变唐朝走向衰落的趋势，毕竟在品德、能力等方面远在穆、敬、懿、僖诸帝之上，而且很少有奢侈放纵、声色犬马、不理政事的记录。

武宗、宣宗二帝能够登上皇帝大位，都是借助了宦官的力量，他们在位期间，又在不同程度上对宦官势力有所压制。与唐朝晚期诸帝相比，因宦官参与朝政所造成的危害，要相对轻得多。但是，相同的是在他们百年之后，把身后的皇位继承大事拱手交给了宦官。究其根本，这恐怕也不是武、宣二帝所心甘情愿的，而是宦官专权的势所必然。自代宗时起，由宦官二人任内枢密使，掌管朝廷机要，承宣皇帝诏旨，自德宗时起又以宦官二人任左右护军中尉，统领禁军神策军。枢密使和护军中尉依恃特权和禁军为后盾，为所欲为。尤其在皇位献替之际，他们便封锁皇宫，完全切断了皇帝与朝廷、大臣间的联系，完全凭他们的标准决定嗣君的人选。武宗在病重之时，连他十分信任的宰相李德裕求见也不得允许，恐怕亦非武宗的本意。宰相只好面对宦官拥立新天子的既成事实签字而已，宣宗之立和懿宗之立莫不如此。

武宗和宣宗的人生结局是相同的，即因服食丹药中毒而死。他们承唐朝初年以来诸帝崇信道教的余绪，大

力提倡和保护道教，礼待道士如座上宾，亲受法策，对道士们鼓吹的长生不死的诡异之术笃信不疑。尤其是武宗，耗费无数的资财，营建富丽堂皇的望仙台、降真台，朝夕与道士厮混其中，切磋所谓神仙长生之术。他们虽然一个自称与道士交往只是为了消遣，标榜虽“百（赵）归真不能相惑”，一个以“见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惑，常以为之诚”自诩，可是，他们都没有抵挡住长生不死的诱惑，从中寻求精神寄托和刺激。结局正与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成了“伎术诡异之道”的牺牲品。武宗、宣宗之死，不仅是对他们追求长生不死、希望“上升”成仙的绝妙讽刺，也暴露最高封建统治者人格中空虚、颓废的一个侧面。

本书就是把武宗、宣宗放在唐朝晚期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来考察，力图客观地反映他们本身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其中既表现了他们进取求治、有所作为的积极方面，又可以看到他们面对衰落的王朝无所作为、随波逐流的消极方面。如果读者能从中了解到这一点，就是作者的最大心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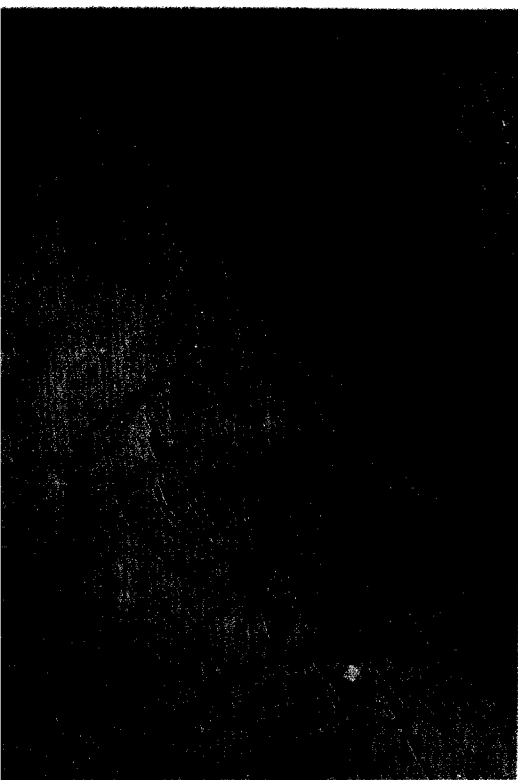
作者像

作者简介：

王德忠，1951年10月13日生。1977年7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留系执教至今，1983年起，在职师从吴枫教授、杨树森教授学习唐宋史，1987年7月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教授。先后开设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科技史等课程，主要从事宋辽金史研究，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著有《萧太后传》、《现代语文版二十六史》等著作。

一日被州二月三十日以上件人終肝
 碑在舊城上當平淮州縣一送亦
 明泰泉碑上記有依於開二月
 昭聖方領制物遠快得有以破
 進更不上十有以行遠昔者仍而
 當上
 六月 日 甯光朴心
 來月 曹上 希兵
 德昌 昭 而 由 為 遠
 在 領 制 物 遠 快 得 有 以 破
 進 更 不 上 十 有 以 行 遠 昔 者 仍 而
 當 上
 白仁新公明州上祀勞人書天何
 事 中 成 而 將 正 折 展 勞 人 知 長 年
 是 德 新 才 成 不 是 長 年 上 祀 上
 寶 祥 上 祀 有 幸 以 祝 操 寶

唐宣宗大中九年发给日本圆珍的过所



唐武宗李枕像

皇帝巡幸左
 神策軍紀聖
 德碑并序

柳公权书《神策军碑》



张仪潮出行图



唐敦煌壁画维摩诘像



唐三彩貼花三足蓋罐



唐褐釉陶碗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章 武宗即位

一、宦官拥立的皇帝	(1)
二、新朝伊始的动荡	(10)

第二章 权臣李德裕

一、李德裕复相	(18)
二、修改《宪宗实录》	(32)
三、仇士良之死	(41)

第三章 平定泽潞之乱

一、刘稹密不发丧	(47)
----------------	------

二、李德裕定计进讨	(53)
三、叛军内讧，刘镇授首	(56)

第四章 威制回鹘

一、回鹘的强盛与衰落	(79)
二、黠戛斯的兴起	(82)
三、唃廝囉来降	(88)
四、太和公主还朝	(97)
五、乌介可汗之死	(103)
六、黠戛斯之封	(112)

第五章 会昌废佛

一、唐朝的佛、道之争	(122)
二、武宗崇道	(128)
三、下诏拆寺废佛	(135)

第六章 宣宗之立

一、武宗之死	(153)
二、宣宗其人	(159)

第七章 党争终结

一、李德裕宠衰	(161)
二、白敏中任相	(165)
三、吴湘之狱的翻案	(170)

第八章 收复河湟

一、吐蕃衰乱	(184)
--------------	-------

二、内讧交兵·····	(187)
三、张义潮归唐·····	(196)
四、党项之扰·····	(200)

第九章 “小太宗”的治绩

一、勤于政事，孜孜求治·····	(209)
二、严以督吏，重振纲纪·····	(214)
三、减轻剥削，改善财政·····	(219)
四、抑制宦官、皇亲·····	(228)
五、雅好诗赋，留心贡举·····	(236)

第十章 遗憾的结局

一、复兴佛教·····	(243)
二、太皇太后郭氏之死·····	(250)
三、死于丹药·····	(253)

附录：唐武宗、唐宣宗大事年表·····	(262)
---------------------	-------

前 言

本书的主人公唐武宗李瀛炎、唐宣宗李忱是唐朝晚期的两个皇帝，如果以宣宗去世的大中十三年（858年）算起，距离唐朝灭亡恰好五十年的时间。他们所处的时代，唐朝的统治危机在不断酝酿和加深，昔日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腐朽和没落。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仅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来说，时起时伏的藩镇割据、混战，愈演愈烈的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相为表里，恶性互动，对唐朝晚期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破坏了以皇帝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分化、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加速了王朝政治走向黑暗腐朽的进程。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面对既定的衰落局面，日益暴露出他们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局限性。

然而，通过对武宗、宣宗时期社会形势的考察，我

们便不难发现，唐朝的统治危机尽管由来已久，各种社会矛盾尽管已经很尖锐，但是还未曾达到一触即发的临界程度。在统治阶级内部自上而下仍然不乏求治进取的愿望，事实也说明，当时也还有具有实现这种愿望的可能性和条件。综观武宗、宣宗的所作所为，虽然不能与唐朝前期帝王的文治武功相提并论，在唐朝晚期特定的社会历史形势下，他们为巩固王朝统治所进行的努力，也是值得称道的。

“牛李党争”是唐朝晚期发生在不同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对削弱统治阶级的力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武、宣时期则处在这一纷争的最后阶段。武宗即位后，改变了文宗时或共用两党，或对两党同时摒弃不用的政策，专用李德裕一党。宣宗即位，又尽反“会昌之政”，全部排斥李党，任用牛党。这种情形固然与武、宣二帝出于个人利害和好恶，或偏向李党或偏向牛党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在牛李二党分别执政时亦未停止倾轧，其所施为也未必全是以朝廷大局为重。但在客观上却避免了文宗时两党互为仇敌，不遗余力，“每议政之际，是非蜂起”，专注于泄私愤、图报复而影响朝政正确决策的情形。

武宗朝政事中，被史家称道的一是平定“泽潞之乱”，二是废毁佛教。“泽潞之乱”是唐朝晚期藩镇公开对抗中央的一起典型事件，这时唐朝的国力虽然已经远远不能与宪宗时相比，朝廷倾全国的军力、财力，历时一年有余，而且是利用了叛军内部的矛盾才最终平定了叛乱。但是，武宗在向来主张对藩镇采取强硬政策的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为之运筹帷幄，平叛的态度十分坚

定，这不仅使发动叛乱的刘稹等人陷入孤立，就是惯于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河北藩镇也慑于压力，俯首听命，接受指挥和调遣。当武宗派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谕河北诸藩，催促他们进兵伐叛时，诸节度使无不“具囊鞬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马，让制使先行，自兵兴以来，未之有也”。武宗平定“泽潞之乱”，对威慑藩镇，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武宗废佛是佛教发展史和唐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武宗实行压制打击佛教的政策，固然与他崇信道教有关，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随着佛教的发展，“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寺院兼并了大量土地，奴役了大批劳动人手，其经济势力的膨胀，与世俗地主阶级以及朝廷的根本利益发生尖锐冲突而引起的。通过打击寺院经济势力，缓解财政困窘，是武宗废佛的主要动机和出发点。

武宗废佛的结果，拆毁寺院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邑堂等四万余处，勒令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没收寺院、僧尼所有的土地“数千万顷”，解放被寺院役使的奴婢十五万人，这些还俗僧尼和解放奴婢，按照废佛法令均充作向国家纳税的两税户。

尽管在此后不久的宣宗时又复兴佛教，但经过武宗废佛的打击，佛教在宗教、经济上的势力一蹶不振，元气大伤，这对于缓和僧俗地主阶级的矛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改善劳动者的地位和境遇，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应当给予肯定的评价。

宣宗李忱在唐朝晚期的诸帝中以力图有所作为而颇受史家称道，盛赞“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誉之为

“小太宗”。这其中无疑包含了史家对宣宗的阿谀吹捧之辞，但通过对宣宗一朝史事的考察，他在勤政恤民、接受谏诤、严以督吏、约束皇亲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进取求治精神，在唐朝统治走向衰落的大背景下，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尽管宣宗的许多措施在具体执行中被打折了折扣，并没有完全落实，甚至变成一纸空文，尽管他的努力不能改变唐朝走向衰落的趋势，毕竟在品德、能力等方面远在穆、敬、懿、僖诸帝之上，而且很少有奢侈放纵、声色犬马、不理政事的记录。

武宗、宣宗二帝能够登上皇帝大位，都是借助了宦官的力量，他们在位期间，又在不同程度上对宦官势力有所压制。与唐朝晚期诸帝相比，因宦官参与朝政所造成的危害，要相对轻得多。但是，相同的是在他们百年之后，把身后的皇位继承大事拱手交给了宦官。究其根本，这恐怕也不是武、宣二帝所心甘情愿的，而是宦官专权的势所必然。自代宗时起，由宦官二人任内枢密使，掌管朝廷机要，承宣皇帝诏旨，自德宗时起又以宦官二人任左右护军中尉，统领禁军神策军。枢密使和护军中尉依恃特权和禁军为后盾，为所欲为。尤其在皇位献替之际，他们便封锁皇宫，完全切断了皇帝与朝廷、大臣间的联系，完全凭他们的标准决定嗣君的人选。武宗在病重之时，连他十分信任的宰相李德裕求见也不得允许，恐怕亦非武宗的本意。宰相只好面对宦官拥立新天子的既成事实签字而已，宣宗之立和懿宗之立莫不如此。

武宗和宣宗的人生结局是相同的，即因服食丹药中毒而死。他们承唐朝初年以来诸帝崇信道教的余绪，大

力提倡和保护道教，礼待道士如座上宾，亲受法策，对道士们鼓吹的长生不死的诡异之术笃信不疑。尤其是武宗，耗费无数的资财，营建富丽堂皇的望仙台、降真台，朝夕与道士厮混其中，切磋所谓神仙长生之术。他们虽然一个自称与道士交往只是为了消遣，标榜虽“百（赵）归真不能相惑”，一个以“见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惑，常以为之诚”自诩，可是，他们都没有抵挡住长生不死的诱惑，从中寻求精神寄托和刺激。结局正与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成了“伎术诡异之道”的牺牲品。武宗、宣宗之死，不仅是对他们追求长生不死、希望“上升”成仙的绝妙讽刺，也暴露最高封建统治者人格中空虚、颓废的一个侧面。

本书就是把武宗、宣宗放在唐朝晚期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来考察，力图客观地反映他们本身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其中既表现了他们进取求治、有所作为的积极方面，又可以看到他们面对衰落的王朝无所作为、随波逐流的消极方面。如果读者能从中了解到这一点，就是作者的最大心愿了。